

明朝时期中国汉籍东传日本研究

林彩虹

(厦门大学外文学院, 福建 厦门 361005)

[摘要] 中日两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源远流长。其中, 汉籍东传日本列岛, 悠久的历史 and 传播的规模不仅构成了中日两大民族文化交流的极其重要的内容, 创造了辉煌的东亚古代文明, 而且对两国文化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主要针对中国的明朝时期两国的时代背景, 探究当时中国汉籍传入日本的方式与特点, 从中窥探中国文化的东传给日本带来的影响, 进一步地了解古代中日两国的文化交流情况。

[关键词] 汉籍; 东传; 文化交流

[中图分类号] K313.3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6121(2008)06-0044-03

一、两国的时代背景

公元1368年元朝被推翻, 朱元璋建立明朝。明太祖朱元璋为了巩固统治, 果断地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在外交上, 进一步加强睦邻友好关系, 先后向邻国派出使者。特别是在公元14世纪初, 除朝鲜半岛外, 中国大陆北方沿海地区也出现了日本海盗, 即倭寇的骚扰, 明太祖迫切地希望通过加强与日本的关系, 来共同制止这种骚扰, 多次向日本通使。

公元1392年, 南北朝统一, 日本进入室町时代。公元1401年足利义满派博多商人肥富、近待僧人祖阿为正副使节, 到明朝呈递国书, 正式修事两国间的国交。日本室町幕府与明朝恢复国交后, 政府间的贸易又开展起来。公元1406年两国签订了“永乐勘合贸易协定”, 这种政府间的勘合贸易, 也叫朝贡贸易。到公元1547年足利义晴最后一次派遣为止, 朝贡贸易持续了近150年。中断近3个世纪的两国关系恢复后, 两国使者频繁往来, 大大促进了两国经济、文化上的交流。在日本衰落多时的汉文学又复兴起来, 唐、宋、元、明的诗文不断传入日本, 也输入了不少宋、元著名字画。

二、日本僧人入明及活动

明朝与日本之间的文化交流是继元朝之后继续深入吸取中国文化, 其中起突出作用的, 与前代一样, 仍是日本的僧侣们。日本入明的僧人可分为两类: 一类是从明朝初年到1404年(永乐二年)实行勘合贸易之前。这一阶段来到中国的日本僧人, 目的和元代入元僧一样, 主要是巡礼佛教圣迹, 领略江南秀丽风光, 一面修禅, 一面又可通过体验中国的生活情趣, 提高他们汉文学的水平。他们在明朝时间较长, 有的人在摄取中国文化方面表现还很突出。

另一类则是1404年实行勘合贸易制度之后, 奉派作为遣明使团的僧人。由于日本方面了解中国也是个崇佛的国家, 而日本以五山为中心的禅僧, 中国诗文及文化的修养在日本人各阶层中最高, 对中国事务的了解也最多。因此, 日本朝廷往往从日本的五山禅僧中选任适当的人, 作为历届遣明的正使、副使、居座、土官或作他们的从僧入明。其中

不乏俊杰之士。例如, 1401年入明的仲芳中正, 因善楷书, 据说曾奉明成祖之救命, 书写“永乐通宝”的钱文。

归纳起来, 入明僧在华期间进行文化活动的内容可分为三类:

“第一类, 遣明使请明文人为他们的诗文集、语录作序、跋, 请他们撰写塔铭、像赞、形录、碑文、篆额等等。他们不远千里, 拿自己或师友编写的作品, 请中国文人落墨题款, 以此为荣, 说明他们对中国文化的仰慕。

第二类是与明朝的官吏、士大夫、文人墨客的互相交流、赠诗唱和等。

第三类现象, 他们请求明朝赐予书籍, 或自己觅购或接受他人赠送书籍。而他们索要或自己搜集的, 大部分是宋、元的, 少数是明初的书。从内容上看, 大量的的诗文集。反映五山禅僧对中国文学的好尚。其次是《文献通考》等类书。第三是《翰墨全书》为代表的日常实用性类书。第四是一些医书^①。总之, 遣明使时期, 那些在日本人中受中国文化浸润最深的以五山禅僧为代表的人们, 利用入明的机会, 继续表现他们对中国文化的渴望、追求与吸收, 但又显出与过去时期不同的特点。当然, 不仅日本僧人入明, 与明朝的文人交流并进行文化交流, 而且也有明朝僧人去日本, 为传播中国文化而努力。例如, 从明初为争取日本来明朝贡而派遣使节, 后来作为对日本遣明使节的回访, 在前期(1401-1419)明朝也曾不止一次地派出使节去日本。

三、明朝书籍东传的方式及图书内容

(一) 日本僧侣在明期间搜集汉籍的主要方式

1. 请求明朝政府照单回赐书籍, 以满足日本对汉文典籍的需求。自14、15世纪, 明朝政府向代表日本国王使明的五山僧侣回赐外典, 似乎已成定例, 所谓“书籍铜钱, 仰之上国, 其来久矣^②。”据《明史·日本传》记载: 永乐六年(1408年)日本遣明使回国时, 请求赐与仁孝皇后撰写的《劝善》、《内训》2书, 明朝廷各给100本, 入明使僧, 也在来华前拟出书单, 提请明朝廷照单赠书。

2. 遣明使僧在华期间, 将或购或受赠图书携回日本。明世宗嘉靖年间以副使、正使身份来华朝贡的日僧策彦周

[收稿日期] 2007-11-13

[作者简介] 林彩虹(1982-), 女, 汉族, 厦门大学外文学院日语系2006级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 日本文化语言学。

良在其日记《初渡集》、《再渡集》中,详细记载了他在中国搜集典籍的情况,仅嘉靖18年7月(闰7月),就购得《鹤林玉露》1部4册,以粗扇2把,小刀3把交换的《续杜愚得》1部8册,接受朋友赠送的书籍更多,有《听鱼纪谈》1册,《白沙先生诗序》3册,《李白集》4册,《文锦》2册,《古文大全》2册,《九华山志》2册,还有《医林集》10册,可知数量之多。

(二) 图书内容

遣明使搜集的典籍,大部分是宋元槧本少数是明初版本。从内容来看,主要有以下几类:“一为经论章疏,僧传僧史。如《法苑珠林》、《佛祖统记》、《名义集》、《神僧传》等;二为诗文集。如1464年所请之书,多数为诗文集及笔记,反映了五山僧侣对中国诗文的推崇及好尚;三为《北堂书钞》、《文献通考》、《百川学海》、《类说》等政书类书,其部帙浩繁,对五山禅僧采撷丽文骈句很有帮助;四为儒学典籍,如《周易注疏》、《尚书正义》、《礼记正义》、《诗集传》、《春秋左氏传》、《大学衍义》、《性理大全》等;五为医学书籍,日本自古重医,遇古医书必买,且愿出高价购买,如策彦周良买《本草》10册,花银10两7分,买《奇效良方》1部,银7两等。”^③

经过唐、宋、元、明汉籍东传以后,在室町时代日本形成了两大著名藏书机构,一为足利学校,二为金泽书库,所藏书籍珍本既多,泽惠后代,现存“金泽本”汉籍,全部属善本书,其中最多的为宫内厅“御物”,还有的被定为“日本国宝”,“重要文化财”。

“足利学校尚存的宋刊本《周易注疏》、《尚书正义》等也被指定为“日本国宝”^④。”

由于明代大量汉籍东传,中国文化对日本各方面都产生了影响,特别是在儒学、文学、医学、艺术等方面影响深远。

四、明朝时期与日本图书交流的特点及原因

(一) 特点

1. 范围更广。除佛教书籍与儒学典籍外,还有诗文集,小说,政书,医学,话论等。日本汉学以禅宗僧侣为主,以镰仓和京都的五所寺院为中心,历史上称为“五山时代”,这时代的僧侣以研究汉学为主,与明朝僧侣来往密切,日僧除研究佛经外,还研究中国文学,从事汉文创作。五山禅院还雇人出版汉文书籍,使得汉籍得以大量流传。

2. 在日本翻刻汉籍。五山禅院还招雇福建刻工,如:莆田俞良甫和福州陈孟荣等人传授雕版印刷技术,刻印汉文书籍,称五山山版。除出版佛经外,还刊印中国文史书籍。这又促进了汉籍在日本的流通。现将明朝中国刻工在日本刊印的书,列成简表^⑤。

3. 在日本还建立收藏图书的机构。足利学校与金泽文库最为著名,其中汉籍是它们藏书的重要部分。足利学校的藏书,据统计,在1615年之前,仅汉纪就有《周易本义》、《尚书正义》、《周易注疏》等宋元明刊本43种。藏书来源有四:“一是上衫氏的捐赠;二是五山僧人的捐赠;三是历代庠主(校长)的私人藏本;四是德川永康的捐赠本。由于足利学校以讲授儒家汉学为宗旨,其藏书皆为《四书》、《六经》、《列子》、《老子》、《史记》、《文选》、《千字文集注》、《孤注蒙求》、《胡增诗注》等。现存宋刊本《周易注疏》和《尚书正义》被定为“日本国宝”^⑥。”金泽文库,始建于日本建始元年(1275),以收藏儒家典籍与佛教书籍为主,皆贴“金泽文库”印记。自战国时代(1467-1567)以后,藏书逐渐散佚。

明朝刻工在日刊印书籍表^⑤

时间	日本年号	明朝年号	书名	刻工
1370年	应安三年	洪武三年	《月江和尚语录》	俞良甫、彦明
1371年	应安四年	洪武四年	《宗镜录》	陈孟荣
1371年至	庆安四年至	洪武四年至	《文选》	俞良甫
1372年	应安五年	洪武五年	《碧山堂集》	俞良甫
1374年	应安七年	洪武七年	《文选》	俞良甫
1374年	应安七年	洪武七年	《白云诗集》	俞良甫
1374年	应安七年	洪武七年	《北铜诗文集》	陈孟才、陈伯寿
1376年	永和二年	洪武九年	《集千家注分类杜工部诗》	陈孟荣
1382年	永德二年	洪武十五年	《佛海禅师语录》	长有
1384年	至德元年	洪武十七年	《传法正宗记》	俞良甫
1387年	嘉庆元年	洪武二十年	《冥枢会要》	俞良甫
1387年	嘉庆元年	洪武二十年	《新刊五百家注音辨唐柳先生文集》	俞良甫
1395年	应永二年	洪武二十八年	《五百家注音辨昌黎先生文集》	俞良甫
1395年	应永二年	洪武二十八年	《般若心经疏》	俞良甫
1519年	永正十六年	正德十四年	《妙法莲华经》	盛继

(二) 原因

日本华人居住区对汉籍的需求。明末清初,不少文人不愿臣服于清朝,纷纷流亡日本,随身带去许多书籍,到日本后积极宣传汉文化,最著名的是朱舜水。“朱舜水(1600-1682),浙江余姚人,精通‘六经’。居留日本20多年,主要从事讲学,备受日本人民尊重,日本文坛学者尊称他为‘朱夫子’或‘舜水先生’他对日本史学最大杰作《大日本史》的编撰事业和水户学的影响极深。”^⑦《大日本史》前后费时

250年,于1906年完成,共397卷,完全模仿中国的正史。本纪、列传、表、志应有尽有,汉文也畅达明通。“水户学派以‘尊王贱霸,大义名分’为宗旨,对幕府维新志士尊王倒幕有很大的影响^⑧。”华人聚居之地多用华语,看汉文书籍,需要大量的汉籍,故中国商人通过商船往来把汉文书籍运往日本出售。自日本长庆年间(1596-1614)明朝商人开始到长崎通商以后,中国商船往来长崎频繁,汉籍东传得数量也日益增多。

有些古籍在中国已散佚,而日本却有保留,通过中国商船的来往,中国学者到日本买回或翻钞带回。如唐代魏征编《群书治要》50卷在中国已佚,而金泽文库藏有镰仓僧人的手抄本全佚,1616年德川家康命令排印刊行,此书后传回中国,对清代典籍校勘帮助很大。明刊本《盘珠算法》和《数学轨轍》是我国也是世界上最早的珠算著作。这两种书在国内已佚,而原刻本分藏在日本内阁文库和尊经阁文库。明代中国研究日本也开始形成一个高潮,仅嘉靖至万历约百年间,研究日本的著作有《日本考略》、《日本图纂》、《筹海图编》、《日本考》、《日本一鉴》、《经略复国要编》等。

五、典籍东传对日本的影响

在日本漫长的古代社会中,日本人以他们对于中国大陆文明的渴望,一刻也没有停止过向中国寻求知识,中国文献典籍便是在这一渴望中传入日本的。它从一个方面显示了中国文化所具有的世界历史意义。在古代,中日两国的文化交流集中体现在书籍上的交流,而中日书籍交流在古代又主要表现为汉籍的东传,作为汉文化集中体现的汉籍,在古代源源不断地从中国大陆输往扶桑四岛。中国自古就有秦代方士徐福东渡日本,“逸书百篇”的传说,说明了汉籍东传早自秦汉时期就有了,也说明了汉籍作为文明载体已开始影响日本的文明进程。

明清时期,尤其是万历中叶以后,日本历史进入江户时代(1603-1867),中日经济文化交流有了更大的发展,输入到日本的汉籍数量更多,规模也越大。

大量的中国典籍输入日本,使日本社会的方方面面都深深地打上了中国文化的烙印。尤其是在思想文化上,日本接受了儒家学说和中国传入的佛教,并加以改进使之更符合日本国民的精神需求;还在模仿汉字的基础上,创新了日本文字;日本的文学也因吸收了中文学的营养而得到发展,著名的汉文诗集《怀风藻》充满了南北朝士大夫的情怀,《万叶集》也同样受到了唐诗和《诗经》、《文选》的影响,“《源氏物语》字里行间可以看到白居易《长恨歌》的影子^⑨。”中国古典名著《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等都出现了日本刻本。日本当今的一些卓有成就的企业家不仅能熟读中国的四大古典名著,并能很好地运用其中的蕴含的战略思想和应变策略,把中国传统文化变成了一门具有现代价值的学问,可见汉籍影响之深。

另外,日本的宗教、书法、绘画、建筑、音乐、舞蹈、生活习俗等也都蕴含着中国文化的特质。总之,汉籍的输入对

整个古代日本社会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中国文化作为日本文化的母体传入扶桑后,被日本民族吸收、扬弃、发展、创造出独具特色的日本文化。

通过两国使者这一特殊的媒介,中日两国进行了广泛的书籍交流,不仅极大地满足了两国人民尤其是日本人民的精神和文化需求,而且促进了两国文化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尤其为日本文化的成长注入了催化剂。“正如日本著名学者内藤湖南所言,中国文化是‘凝成豆腐的盐卤’。豆浆之中,虽然已经有了豆腐的成分,但是还需要加上其他力量使其凝结,而中国文化就是像卤水那样的一种凝固剂^⑩。”

[注 释]

- ①陈玉龙,杨通弓.汉文化论纲-兼述中朝中日中越文化交流[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 ②瑞溪,周凤.善邻国宝记[M].卷下.引自陆坚,王勇.中国典籍在日本的流传与影响[M].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 ③彭斐章.中外图书交流史[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
- ④王勇,陆坚.中国典籍载日本的流传与影响[A].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0.
- ⑤王勇.中日汉籍交流史论[C].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3.
- ⑥彭斐章.中外图书交流史[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
- ⑦王勇.中日汉籍交流史论[C].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3.
- ⑧北京市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会,中日文化交流史论文集.朱谦之、朱舜水与日本[A].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 ⑨胡世庆,张品兴.中国文化史[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1.
- ⑩(日)内藤湖南.日本文化史研究[M].储元喜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参考文献]

- [1]王晓秋.中日文化交流史话[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 [2]王勇.(日)大庭修.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
- [3]王勇.唐宋时代日本汉籍西渐史考[A].中日关系史考[C].北京: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5.
- [4]王勇.(日)大庭修.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
- [5]王勇.(日)大庭修.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
- [6]王勇.(日)大庭修.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
- [7]黄仁生.汉籍的东传及回流[J].常德师范学院学报,2002.
- [8]周一良.中外文化交流史[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
- [9]方一新.世说新语[A].王勇,王宝平.<日本文化是历史踪迹[C].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1.
- [10]胡世庆,张品兴.中国文化史[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1.
- [11](日)内藤湖南.日本文化史研究[M].储元喜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责任编辑]心安